

李笑野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顾易生题



先秦史学与文化研究

本书由上海财经大学资助出版

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

李笑野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李笑野著.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7

ISBN 7-81049-426-0/I·02

I. 先… II. 李…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先秦时代-文集
②文化史-研究-中国-先秦时代-文集 IV. I206.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1549 号

特约编辑 陈翔燕

责任编辑 张小忠

封面设计 周卫民

XIANQIN WENXUE YU WENHUA YANJIU

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

李笑野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 邮编 200083)

<http://www.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印刷十厂印刷

上海浦江装订厂装订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850mm×1168mm 1/32 8.875 印张 230 千字

定价:20.00 元

前 言

近二十年,文学史研究的方法异彩纷呈,给人带来诸多启发。我在领略这些方法的同时,也时时感到,清代学人在学术实践中成功运用的,讲求“读经自考文始,小学明而经学明”,辞章、义理、考据并重的方法是研究文学史,尤其是研究上古文学史所不能忽略的有效工具。

文学史的研究,首先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解读,而具体作家、作品的生成乃是其所处的整体文化环境的产物。时代的流迁、当时文化环境的变异,造成了我们认识古代作家、作品的隔阂。对此隔阂的突破,让文献留存下来的作家、作品还回到其所生成的文化背景之中,求取一个近真的样态,这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工作,非如此,则不足以正确认识文学史。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去对作家、作品作以判断、定位以及史的意义之阐述,其论断才会有说服力。可以说,对作家、作品的认识越是切近当时的文化背景,该研究成果就越可信、质量也便越有保证。

当然,这并非是停留在史料学意义上的工作,而是说我们在廓清研究对象面貌的同时便伴随着对其文学史意义的真实感受和价值判断。如闻一多先生治《诗经》即以传统方法为基础,融通文艺学、民俗学等知识对具体作品进行文本的忠实解读。在《匡斋尺牋》中谈《芣苢》,他强调:“每读一首诗,必须把那里每一个字的意

义都追问透彻,不许留下丝毫的疑惑。”他把这看成“原则”,贯彻在治《诗》的全过程。其梳理诗篇,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别出己见,而每出新见又未尝不是以尽可能周详的考据做基础。他的《新台鸿字说》于“《传》不为‘鸿’字作训,殆以为鸟名,人所习见,无烦辞费”处,发而为疑,周详考证。在此“无疑”之疑处得出新见,一词之解读,使诗的意象豁然开朗,令其复现了本来面貌。如若无此解读,则对该诗进行切近诗意的审美感受与评价就成了空谈,至少是走了板,甚或是南辕北辙。他的《姜嫄履大人迹考》、《说鱼》等,则又是在传统方法的基础上,融合当时先进的理论思维方法所创获的成果。《姜嫄履大人迹考》将“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语句的训释还回到上古文化情境中去求证。在考绩了古史实与当时文化心理之后,出以该句的今释,使这一古老史诗的真实性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证,同时也让人感到了这古老史诗内容涵盖的丰富性,为人们深入认识这篇史诗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说鱼》篇综合运用了训诂、考据和民俗学的方法,成功地破译了一个古代隐语,这一破译,既弄清了《诗经》的同类意象创造,也揭示了古诗歌创造所运用的一种语义方法,为一系列具体文学作品的认识作出了贡献。《说鱼》是由训诂进而深入到民俗、礼俗的观念之中获得其结果的。在研治《诗经》过程中,闻一多先生绝不仅仅是就《诗》说《诗》,他还对当时的文化背景进行了苦心追寻。这除了见于对《诗经》本身的诠释之处外,还有对上古其他典籍的梳理。正是这种对当时整个文化背景的尽可能详悉而充分的认识,尽可能细致而充分的感受,尽可能自觉而充分的把握,他才能从容地治理《诗经》,也才能将《诗经》求取一个近真的面貌。闻一多先生的《诗经》研究成就,可以说是建筑在传统治学方法和当时先进理论思维方法基础之上的,两者舍其一则不能获此巨大成就。又如姜亮夫先生治《楚辞》,也是从传统的治学方法入手,综合语言、考古、古史、文化等学问去“求取一个近真的屈子”(见《屈原赋校注》),就中,先生又

特别注意语言学。雅各·格林曾说：“我们的语言也就是我们的历史。关于各民族的情况，有一种比骨殖、工具和墓葬更为生动的证据，这就是他们的语言。”熟悉了当时的语言也就熟悉了当时的情况，因此，从语言入手的考据便显得十分重要。为此，姜亮夫先生有《屈原赋校注》，也有长篇巨制的《楚辞通故》。在《楚辞学论文集》中又有关于楚文化的研究成果。从文词训诂到文化背景，由个别研究到综合整理，每一个结论都坚实而自成一说，从而为楚辞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水准。综观这些学人，他们皆以传统治学方法为基础，再融会先进的理论思维，进而创造出卓越的学术成果。

这些都是前辈学者为文学史研究提供的成功经验和有效方法。对此，自己“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数十年来，沿着这样一条路径认真地探索，力争留下一点踏实的足迹。本书稿所收录的就是在先秦文学和文化领域的部分研究心得。

书稿分作三个大的部分：《周易》探索、《诗经》研究和上古歌谣、神话与上古文化探赜。

在中国文化史中，《周易》是第一部包罗宏富、体系完整的大型文献。作为思想巨著，它对中国文化史发生着本质的、具有着规定意义的影响。了解《周易》的思想内容，尤其是它的思维方法，便可能对中国传统的思想与文化进行本质的、提纲挈领的把握，进而对发生于这一背景之下的文学史予以更深层次的体味。因此，在《周易》研究部分，我分若干专题对其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以追寻中国文化史的思想根源，廓清建筑在这一基础上的文学史、文学思想史的背景依据。尽管这一挖掘尚未完备，我还在继续努力，但初步的较系统、较细致的整理这些方面的思想资料已给我的文学史认识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因此将目前的收获归理出来，收入书稿。

《诗经》是我自一九八二年开始即作为学习、研究对象的专题。

它既作为我研讨的对象,也是我切实认识上古文学与文化的津梁。在对它的研读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从文本到有关这部诗集的若干问题都无法避开,而对这所有问题的涉猎又都无一能逃离对上古文化整体把握的功夫,因而,对《诗经》的介入虽早,从中获取令自己大致满意的结果却非常之艰难。博士论文我作的是《诗经》专题,因其中的主要内容是两汉《诗经》学,可以自成格局,所以将先秦部分的《诗经》心得抽出来放入这一书稿,算作先秦文学研究的内容。

上古民俗、礼俗是构成上古生活实在内容的重要部分,它不但展示其生活,而且承载着清晰的理念和审美趣向。认识上古文学,显然它们是无法跳越的障碍,因而,这一部分也是我着意关注的对象,作了一点研讨、整理,它们也成为这一书稿的有机组成部分。

书稿的各专题有机关联,这样的工作,不止是为着解读、求取文学作品的近真样态,也是期望对先秦文学与文化互动关系有所寻绎与发掘。书稿中各个题目虽自成格局,并且有些问题的探讨结果已作为论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但就整体上说,还是相对具有其系统性的,因而,书稿不是一部论文选集,而是对先秦文学与文化专题研究的著述。

总之,在这里诚惶诚恐地将自己多年的学习、研究心得整理出来,意在借此诚恳地求教于方家,期望多获教益,以利于我今后更切实、更有成效地耕耘。

作者
2000年元月

上编 《周易》探索

第一章 《周易》的思维观念及辩证法思想

第一节 《周易》思想方法产生的文化背景

产生于殷末周初的《周易》^①，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思想方法的一次系统的总结与升华。它的出现，它的振古烁今的巨大成就的取得，自有深远而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它是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长久的不间断的探索与总结的产物。作为一种较高级、较成熟的思想方法，它绝非生自一时，产于一地。史有“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的讲法。对此，人们一直争议纷纭，难一其说。如果姑且不论具体的《连山》、《归藏》、《周易》的真实的样态如何，仅就其思维方法的产生与传承而言，则伏羲作八卦的追溯，《连山》、《归藏》、《周易》的递演是自有道理的。文化的发展，既有它不断否定更新的一面，也有它稳定性的一面。泰勒在对原始文化进行考察研究之后，就曾经得出过这样的结论：“当一种风俗

^① 《周易》卦、爻辞最后编纂写定是在西周初叶；著作人无考，当出于其时巫史之手；著作地点当在西周的都邑中。就是说，作为一部具有完整的经卦、辞说的巨著，《周易》的出现是在殷末周初时期。这一点，详见本书《周易卦爻辞中的殷周民歌》一章所引顾颉刚、李镜池诸先生的论断。

习惯,技艺或观点充分地传播开来的时候……它们像巨流一样,一旦为自己冲开一道河床,就成世纪地连续不断地流下去。这就是文化的稳定性。”(《原始文化》,爱德·泰勒著,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74页)它的合理部分被稳定下来,一代一代,历时久远地传递过去。生产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又在给它的充实提供着条件,使之向更精深、更高级的方向发展。因此,深广的文化背景是《周易》产生的基本根据,欲说明《周易》的思维观念及辩证法思想,首先就必须对它赖以产生的社会发展条件作出概括的阐述。

除去茫昧缥缈的古史传说不论,就田野考古无可置疑的材料而言,我们看到,在相当于夏代文化遗存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便已经有了国家政权的象征——宫殿建筑。(《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80页)可以想见,当时已经有了比较严整、有序的社会组织系统。这里,包含着人们对人类自身的艰苦的认识,可以说,它是人们对人类社会自身认识、整理的一种成果。

在商代考古中,最集中、最丰富、最能展现商代社会面貌与思维成果的当首推甲骨卜辞了。就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来看,卜辞中即已包罗宏富而且显现出细致入微的探索。依陈梦家先生的《殷墟卜辞综述》,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真实可信的大背景:

首先给予我们深刻印象的是殷人对历法天象的探索。卜辞中已经呈现出平年为十二个月,闰年为十三个月的较严整、科学的纪年法。一年之中有“春”、“秋”的季节分别。十天称为“旬”;记日用干支纪日法。这种天干地支相配的用法一直为后代所沿用,可见它的合理与成熟。一天之中的时段区分也很明晰。卜辞用“旦、明”(日出之时)、“大采、大食、朝”(朝食,即今上午八时)、“中日、盖日”(日中之时)、“昃”(日已过午)、“小食”(即今下午四时)、“小采、莫、昏”(黄昏日入)、“夕”(夜)这一系列时间概念,将一天中的时段界定得很明晰。由此可见,至少在殷人那里,人们对时间的理解与界划已经相当科学、周密,反映出殷人清醒的时间理念。卜辞对天

象的记录也十分严谨。卜辞中“月食”“日食”和东南西北风各有专名。“雨”“霾”“雪”“云”“虹”“云霞”“暘日”(日覆云无光)、“啓”(昼晴为啓)“霁”(雨止为霁)、“霏”(雨止云罢)、“星”等一系列记录,表明了人们对自然现象的关注、探索和理解。这种探索的艰苦努力,如陈梦家先生的剖析:“历法是根据天象以一定的单位对于长的时间间隔的计算。古人对天体的运行,最初只观察白昼、黑夜、月盈、月亏和寒暑往返等现象,后来渐渐有了日、月和年的种种观念。天时观念的发达,是与农业的发展相关连的,因为农业需要寻求天时周期的规律,以便及时地播种和收获”。(《殷虚卜辞综述》,陈梦家著,中华书局1992年版,217页)这说明,生产的需要,谋求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已迫使人们不得不对时间现象、自然的变化作深刻探究,以此得到对它们的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同时,我们也因此深深觉察到了殷人自觉的时间、变化的理念。

卜辞给我们另一个深刻的印象是殷人清醒的地理方位的空间观念。

殷王朝的政治中心“不常厥邑”屡屡迁徙。陈梦家先生将其迁徙归为三段:“(一)契至汤八迁,(二)盘庚以前五迁,(三)盘庚以后的迁徙。”(《殷虚卜辞综述》,311页)频繁的迁徙可以说明殷人对地理的调查与理解。如果参以《诗经》大雅中的《生民》、《绵》、《公刘》中周人之迁徙认真勘察地理的情形,这一点就十分清楚了。殷王朝四边方国林立,王朝与方国因各种各样的交道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据《殷虚卜辞综述》勾画:“根据了古史传说,卜辞所见都邑和征伐的方国,我们可约略地划出商的区域,其四界是:北约在纬度 40° 以南易水流域及其周围平原,南约在纬度 33° 以北淮水流域与淮阳山脉,西不过经度 112° 在太行山脉与伏牛山脉之东,东至于黄海、渤海。”由此可以看出殷人的基本活动空间。卜辞又屡见“四土四方”的概念。“四土与四方的意义本来是有差别的:四土指东、南、西、北四个方面的土地,四方指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卜辞‘方’其

用法有五：(1)纯粹的方向，如东方、西方；(2)地祇之四方或方；(3)天帝之四方，如‘帝于东’‘祭于西’；(4)方国之方，如羌方、多方；(5)四土之代替。”(《殷虚卜辞综述》，319页)卜辞又有邑与诸侯之鄙邑的地域区划，等等。从殷王朝的活动所及、占有的地域以及各种政治区划和其清晰的东西南北等观念，我们看到了当时人们对于空间的清晰理念。

就人们对客观外界的认识来看，通过以上叙述，我们不难发现，在殷人那里，人们就已经有了对时间、空间以及变化运动的较为成熟的探索成果，人们对时间与空间的把握是自觉的、能动的，是尽可能地契合于自然规律的。

就人们对人类社会自身的认识来看，商代人也已取得了辉煌的认识成果与物质成就。

商代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殷人的农耕有“一人跲耒而耕”，也有多人协作的大规模的“畋”。这就是《尚书·多方》“力畋尔田”，周诗《噫嘻》“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载芟》“千耦其耘”所描述的大规模的协作耕植。卜辞有数量极多的各种各样的“卜年”——占卜收成，“卜雨”——占卜时雨等和农事直接相关的卜辞。从殷墟出土的磨光石器和大量的集中储存的收割石农具来看，从传世的殷人大量青铜酒器以及西周初周人对殷人酗酒失国的警惧看，殷人的农业是十分发达的。“要进行农业，必须要有(1)充足的水量，(2)培植适宜于当地土壤气候的种子，(3)适宜的土壤，(4)可以耕作的农具，(5)有农业生产技术的人。”(《殷虚卜辞综述》，523页)这是构成农业发达的必要条件，而这些条件的实现，就必须有分工、有合作、有系统的指挥。就殷人的农业生产成就看，至少可以说殷人已经以农业为媒介，将人作了系统的整理与调驭，使农业生产构成了分工—联系的一个大系统。另外，在商代考古中有铸铜作坊遗址、制骨作坊遗址、制陶作坊遗址。(《中国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商代考古》部分)有出土的制作精美的玉

器、品类繁富的青铜器，甚至有“司母戊鼎”这样壮观宏丽令人叹为观止的青铜艺术巨制。这一切都说明着殷人手工工业的发达。进而我们看到，以农业、手工业这些社会的基本生产实践为依据，构成了殷代社会的个别劳作与普遍联系的社会系统。有了这样大规模社会联系的现实，就必然要促进人们更周密更高级的思考与理论概括的思维方式的出现。

就社会组织看，商代奴隶制国家机器已高度发达。商代社会存在着大量父系宗族，卜辞中已可以列出一个较完整的先公和先王世系。（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卜辞所见先公先王世系考》、李圃《甲骨文选读》中殷代先公先王世系表，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年版）这种以父系递传为核心，通过祖先崇拜、血缘身分、等级制度、财产关系来维系政权结构的事实已经在商代存在。虽然现有材料还不足以说明殷代宗法及其具体的情况，但至少通过卜辞所记的祭祀系统、亲属称谓、王位继承法和宗庙宗室制度，可以看到“殷代对于亲属间的亲疏关系已有所区别。”（《殷虚卜辞综述》，497页）亲疏的区别，就构成了血缘身份、政治等级、财产等级的差异，相传既久，也就成了保留与淘汰的差异。为了维持个人的地位与财产，就必然出现复杂的矛盾斗争，或明或暗、或激或缓，呈现着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多样形态。在商王朝内和族邦又有以“臣正”“武官”“史官”为首的官僚系统。从卜辞反映出的情况看，这是一个相当庞杂的体系，名目繁多、各司职守，构成了正常运转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的发达，证明着人们认识社会的水平和把握社会的能力。同时，在庞大的政治体系中，我们也看到了由于血缘、等级、财产的客观现实所构成的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使人置身于一个系统中并发生着普遍联系。这一事实不能不迫使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进行着更高水平、更为深入的思考，以达到对自然社会的运行、人与人关系的运动规律的正确认识。

由上述可见，殷商文化的高度发达，已使社会超过了个别地

域、个别部门而达到了一个集中的系统的普遍联系。在殷商时期，人们对自然界也有着极为丰富的知识，客观现实已经提供出了成熟的条件，完全可以使人们综合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去研究其联系、规律从而获得一种宇宙观、人生观，构建一种成熟的思维方法。

上述夏殷文化这样深远而广阔的背景，就是《周易》的思维观念及其辩证法思想产生的基本根据，有了这样成熟的、深厚的文化背景，才使《周易》能够以它完整的符号系统和独特而成功的思维方式，构成了中国式的思维模式，其理性思辨的指导意义才能历久而不衰。

第二节 观物取象

《周易》的思想是通过它自己的载体传达出来的，那就是它以“象”“数”为本，它的一切思想和内容均寓于“象”“数”之中。因此，欲明《周易》的思维观念及其辩证法思想，就必须先明其“象”。

展读《周易》一书，盈乎眼前是满目形象，有具体的器物、有生活的场景、有家务琐事、有战争的惨烈、有鸟鸣唱和、有历史故事……初一接触，既让人感到亲切，又让人感到茫然。原来，它是以“象”来“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的。在前面述及的那深远而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易》的创作者们，既接受前人的思维成果，又有自己广阔的观察空间，他们正是通过对自然和社会各色各类现象细致的观察，丰富的感受，深切的体会，透彻的认识，来融意入象，在一般的、平易的“象”中容纳了作者们深刻的思想。作者们饶有特色地将其对人生、社会、自然规律的深刻把握，通过在长久的、大量的占事活动中精选出来的事例表达出来，使之既“通神明之德”——将大自然变化运行的德性充分揭示，又“类万物之情”——刻画出天地万物的情状，使人读《易》而通达感悟，得以对自然、人生、社会有着深刻认识和理解。

《周易》的创作者们,将“象”纳入六十四卦的大系统中,使所有的“象”受制于这一系统中的时位、相互关系而有着它自己的含蕴,让“象”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去“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朱熹《周易》本义·序),错综地表现出天人之际、事理变化、吉凶向度的规律。

六十四卦象表述了六十四种带有规律性的范畴;爻象表达了在此时、此位、此卦各爻的诸关系中的或吉或凶、或穷或达的状态。

我们这里以《鼎》卦为例,先叙述卦象的取象。

《鼎》以下巽(䷸)上离(☲)构成卦象。鼎是生活中真实的器物,卦取鼎象,并在这一具体的象中注入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表现了作者深刻的社会政治见解。

卦象下巽是木、是风;上离是火,《彖》辞说:“以木巽火。”这里木燃火旺,有以鼎主烹饪之象。鼎是上古烹饪用具,上古烹牲肉,先将牲肉放进镬里煮,然后再放进鼎里,加入佐料,继续烹煮,使之五味调和。鼎有化生为熟、化寡味为美味的作用,这样它便具有了将事物调剂成新的意义。鼎又有“物象之法”(见《正义》),是象征权力的“法器”。夏铸九鼎,经殷商而传至周。《左传》载楚王问鼎,表现出他有图谋周室政权的野心。在这样的取象中,鼎卦就具有了深刻的含义。《彖》辞揭示:“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彖》辞首先断定,鼎是观物取象,这个象就是木顺从火,在鼎下燃烧烹饪。这既是一个自然之象——生活中所习见的现象,又是一个含有寓意的象征。朱熹解释“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时说道:“享帝贵诚,用牲而已;养贤则饗飧牢礼,当极其盛。”(《周易本义》)鼎也用来烹煮牲肉享祀上帝。君权是受天之命,是上帝授予的,因此,对上帝就必须虔敬、小心,不然就有被革去君命、王朝覆灭的危险。商汤革夏命,周武革殷命,就是历史的成例。王朝的一切顺利吉祥都要归功于上帝,没有上

帝的护佑,王朝将不堪维持,天下将没有宁日,所以要享祀上帝。祭祀上帝,贵用其诚,用牛牯就可以了。《礼记》讲:郊天之时,用“特牲”。“特牲”就是单独一个牲,用牛牯,虽然俭朴,但能突出贵其诚的意思。养贤则不同,任用贤人,要隆礼而遇之,用太牢之礼,即牛、羊、豕三牲齐备。国有贤人,贤人为国尽忠尽智,那样,就会政治稳定,国家大治,不断涤除阻碍社会运行的障碍与陈腐,使政权保持活力,革故鼎新,君权稳固。所以养贤之诚表现在国君情意殷殷,对贤人尊位隆礼而显之。这里享上帝、养圣贤都是在说如何巩固君权。接下去,《彖》辞讲养贤而君臣相得,使国君能无为而成,天下稳固。“巽而耳目聪明”,是借成卦之形而言卦中之大义。下卦巽是逊顺,上卦离为明。这是说贤人获养而竭诚尽智辅其上,在上者自然就会集思广益,明察秋毫,达到耳聪目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又是就卦象中的爻位所显示的意义来就象明义。卦中六五爻居君位,阴爻而居刚位,以柔中之德践履刚尊之位,意欲有所作为,并且有着宽宏柔中、虚怀谦和、从善如流的美德。九二是阳刚之体,强健有力、阳居阴位、刚柔相济,有力而稳健。九二居臣位而辅佐六五之君,励精图治、发奋有为。六五得中又以自己的德行下应九二阳刚,宽柔纳臣、礼贤下士,两爻配合默契、相得无间,有君臣如此,国家怎能不安泰祥和、蒸蒸日上? 所以卦辞讲《鼎》之卦象为“元吉、亨”——至为吉祥,亨通,国祚无碍,政权稳固。观此卦象,又要“君子”应当效法鼎器体制端正,浑实凝重之象,效法鼎器调剂成新,革故鼎新,自新新人之德,端正己位,严守使命,以免入于邪途,负了职守,坏了政权。《鼎》这一卦象,象征获得王权,又包含了如何巩固王权这一严肃而重大的历史课题。

这一卦,之所以警策动人,之所以严肃重大,除卦象本身所显现的内涵外,还因为它处在六十四卦这一大系统中的特有位置。它的前一卦是《革》,朱熹说:“革,是更革之谓,到这里(按,即“革”之时)须尽翻转更变一番”,“须彻底新铸造一番,非止补苴罅漏而

已。”(《朱子语类》)如同“汤武革命”，旧王朝废，新王朝兴；陈腐败坏，阻碍世道者废，通变鼎新、顺应天理人心者兴。这是社会运行的铁的规律，所以《革》卦之后即是《鼎》。“革之大者，无过于造九鼎之重器，以新一世之耳目；而鼎之为用，又无过于变革其旧者，咸与为新，而成调剂大功。故《鼎》承《革》卦，以相为用。若器主烹饪以养，犹其小焉者也。《大象》括以‘正位凝命’四字，养德修身、治家治国之道，为有天下者所取法，皆不能出其范围。”(马振彪《周易学说》)

一个平易可感的物象，具有这样深沉而严肃的历史涵盖，这便是卦“象”特有的表述方法。它不是一个具象的描摹，而是一种思维工具，告诉人们经验，诱导人们深思，提供一种思维方法。

卦象如此，爻的“观物取象”也无不如此。

《大过》卦九二，爻辞云：“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大过》卦九五，爻辞云：“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誉无咎”。

这两个爻象，撷取了生活中一个有趣的现象。九二爻是说，枯败的杨树，看上去生命力已委顿衰尽，但又生出了嫩芽新枝(稊，通荑，树木新生的芽、枝)；就像一个龙钟老汉，娶了一个少女作妻子，这没有什么不利的。九五爻是说，枯败的杨树，又开出了新花，一个龙钟老太婆找了一个健壮的青年作丈夫，这没有什么佳誉可也没有什么咎害。这是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又并不是常见的现象。这样的事颇有惊世骇俗的味道，让人感到新奇有趣。《周易》作者拿它来说爻义如同拉家常一样亲切、可感，如在眼前。然而，这平易的事象一旦处在全卦的系统中，就有了别一番深刻的道理。

大过卦象为䷛，下巽上兑，象征“大为过甚”。阳刚称“大”，卦中四阳爻皆居中排列，两阴爻分居上下末端，是刚大太过之象。卦辞云：“栋桡，利有攸往，亨。”这一卦象，有似栋梁弯曲。(栋，栋梁，

支撑屋脊的主要部分；桡，通“桡”，曲折）朱熹《周易本义》解释说：“上下二阴不胜其重，故有‘栋桡’之象。”这是由于两端柔弱，敌不住中间四爻的刚强，所以难胜重压，以至于下桡曲折。但“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象》辞）。这里说的“刚”、“中”是指九二、九五两爻阳刚居中；下卦巽有“驯顺”义，上卦兑性为说（悦），阳刚能居中调剂，使得事物沿着驯顺、和悦之道而行，那么对于阳刚太过的“栋桡”险象，就会很好地整治，利用这样的方法前往、施行下去，就会亨通。卦象告诉人们，“大过”之时，事物反常，亟待整治。程颐《伊川易传》述此云：“如立非常之事，兴百世之大功，成绝俗之德，皆‘大过’之事也。”阳刚主体过强，附属因素阴柔又极弱，“生态”失调，物象反常，极需“大过人”之举来奋力整治，这就是“大过”一卦的大背景。

在这一大背景下，九二之“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就不仅仅是对一个生活现象的叙写，而是一个特殊的喻式。

处“大过”之卦，九二以“过甚”之阳得处中位，上与九五同是阳刚不能相应，于上六阴爻又远隔三阳之阻，只有下比初六，而初六之阴又以柔弱处全卦之下，只有极为敬慎承事上面阳刚才能无咎免害。这样，两爻相与便各如所愿，阴阳相得、刚柔相济皆获其益。使刚重者减弱，使柔弱者力量增强，减轻“栋桡”险情，以成济险之功。喻之婚姻，正是“其阳过也，如杨之枯，如夫之老；其相济而有功也，如枯杨而生稊，如老夫得其女妻。”（《周易折中》引王申子语）

于生活常情而言，老夫得女妻固然与世俗相悖，有过于人们的理解与情感接受的范围，但上古三代父系社会中，以男性为中心，则是历史产物。老夫少妻，以老夫之饱有生活经验、练达博通，可使稚亚少女早早成熟；以稚亚而富有活力的少女相伴生命力衰退的老夫，可使老夫焕发活力，这是以过甚（九二过刚、初六过柔）相配的道理。（见《周易正义》本爻王弼注：“老过则枯，少过则稚。以老分少，则稚者长；以稚分老，则枯者荣；过以相与之谓也。”）于爻